

制度变迁与贵州区域 经济变化研究

◆肖良武 / 著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China Modern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制度变迁与贵州区域 经济变化研究

◆肖良武 / 著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China Modern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度变迁与贵州区域经济变化研究/肖良武著. —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7.8

ISBN 978 - 7 - 80221 - 408 - 8

I. 制… II. 肖… III. 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研究—贵州省 IV. F1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9801 号

制度变迁与贵州区域经济变化研究

肖良武 著

出版者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东城区东四十条 24 号
青蓝大厦东办公区 11 层
邮政编码 100007
电 话 (010)68320825(发行部)
(010)68320498(编辑部)
(010)88361317(邮购)
传 真 (010)68320634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1.75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21 - 408 - 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任何创新性的探索，都是从逆向思维和求异思维中起步的。

肖良武博士的新著《制度变迁与贵州区域经济变化研究》，如果按惯常的思维路径，定然是遵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规律，起点应从研究贵州区域经济变化的进程开始，然后再考察相应的或非相应的制度变迁及其对区域经济产生的影响。然而，令我耳目一新的是，他在遵循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种辩证关系的同时，一反常态，将区域制度变迁作为起点，去审视贵州区域经济的变化。这一新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可以说是制度经济学在一个特定地域空间的实证性研究，或者是利用制度经济学、历史学研究区域经济变化的新方法的探索。

这种研究方法，犹如登上高峰，反观来路，过程和细节虽然模糊了，但宏观的、整体的面目却更清晰，而且有了可以同周边的事物进行鸟瞰与比较的平台，对于所研究的对象来说，更易于凸显贵州自建省以来，近六百年间区域经济的发展对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非经济因素依赖的最大特点。贵州建省，原本就是政治、军事需要的产物，而非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省以后，至本世纪与上世纪末之交的西部大开发以前，贵州区域经济或者说贵州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是在体现了军事政治之因，结出了经济之果的违反常态却又符合逻辑的过程。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出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学在这几十年间兴起。它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对于区域经济规划和发展的指导性毋庸置疑，而对于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导向性也充分显示出来。作为以史学研究为本行的我，在涉猎一些区域经济学理论的著作

后，以外行的眼光和大有局限的知识结构去解读时下普遍认同的关于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定义：区域经济学是运用区域经济学理论探寻经济活动空间规律的科学。我以为此定义大可探究。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离开了时间单元的空间单元是不正确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区域经济学是运用区域经济学理论探寻经济活动空间规律与时间规律的科学。时间单元与空间单元叠加下的经济活动，才会产生区域经济。肖良武博士的这部著作，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如下的思路和上述的构想：研究区域经济必须与研究区域历史相结合。从历史的演进中去探寻区域经济形成、发展变化的轨迹。把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置于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把纵向的经济史的时间脉络与横向的经济地理空间板块联系起来，在这种多学科的纵、横向的交错联结中，对某一特定时空下的区域经济形成的历史的、经济的、地理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种种原因、不同形态及其发展趋势做出的判断，才是接近真实的。交织在书中的纵向时间与横向地域空间中的贵州区域经济便有了清晰的源流、波澜。而“制度”则是促成贵州区域经济变化的重要条件，其在不同时、空下对经济发展变化的正、负向作用就显示得格外充分。

作者在书中沿着历史的轨迹顺向地展示了“时间”在区域经济变化中的年轮，同时又逆向地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展示了贵州区域经济的“空间”形态。正是这两个方向的探索，使本书在叙事之中蕴涵了区域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特色。当然，作者对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变化的不同层面、不同方向的影响还欠深入分析，经济方面的史料尚需进一步发掘。我想，如果假以时日，他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在汗牛充栋的著述中，本书有所探索、有所创新足矣，读者对之何必求全责备呢！

本书展现的新视角，为贵州乃至更广阔的地域提供突破观念、机制、体制束缚，在经济已经有了巨大发展和期待更好更快发展的关键时刻，加大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力度，进行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创新，已经势在必行。这是我读了肖良武博士的书稿后所产生的联想。或许，这也应是作者以学市观照现实的初衷吧！

感慨系之，是为序。

熊宗仁

2007年8月8日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目 录

序言	熊宗仁	1
第一章 制度变迁与区域的相关理论问题		1
第一节 制度变迁的概念		1
第二节 区域经济的概念及区域的划分		4
第三节 贵州经济区域的形成		8
第二章 制度变迁作用下的区域经济		27
第一节 行政制度变迁		28
第二节 改土归流的制度实施		33
第三节 金融制度变迁		36
第三章 贵州区域经济的变迁		41
第一节 区域经济的成长		41
第二节 区域经济成长阶段——以工业化进程为中心		81
第四章 贵州区域经济的地位		99
第一节 与周边地区经济的比较		99
第二节 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变化		125
第五章 贵州区域经济发展滞后原因分析		140
第一节 提升区域经济地位的制约因素		140
第二节 制约贵州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		160
主要参考文献		176

第一章

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的 相关理论问题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能够清晰地看出制度、制度变迁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处于现代化的今天，人们以史为鉴，越来越关注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尤其对于那些制度极为短缺的国家或地区而言，制度变迁已经得到因实施新制度而受益者、制度供给者及研究者的更多重视。

关于区域经济问题，早在 20 世纪前期，我国有许多学者开始从经济地理的角度进行研究。^①新中国成立以后，区域经济问题受到更多的重视。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我国区域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完备的学科。

要想研究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首先有必要了解制度变迁、区域等相关的理论问题。

第一节 制度变迁的概念

一、制度的概念

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某

^① 1935 年张其昀的《中国经济地理》，1939 年张肖梅的《贵州经济》与 1942 年的《云南经济》，1940 年郭垣的《云南省经济问题》，1943 年张印堂的《滇西经济地理》，1945 年蒋君章的《西南经济地理》，1946 年丁道谦的《贵州经济地理》等论著，对当时中国经济地理进行了研究。这一阶段，学者们的重点是研究我国发展经济的自然资源、自然条件和经济区划，侧重于从实证角度陈述我国的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及其对发展经济影响的评价，在产业研究方面主要侧重于介绍各种物产和产业的分布。参见陈秀山：《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1~2 页。

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T. W. 舒尔茨将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康芒斯在其《制度经济学》一书中所说的制度是指约束个人行为的集体行动而言，而在集体行动中，最重要的是法律制度。道格拉斯·C. 诺斯说，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青木昌彦则将制度定义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舒尔茨关于制度定义被以后研究制度的学者所接受。在舒尔茨看来，制度是为经济服务的。他列举了制度的经济功能：（1）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如货币，期货市场）；（2）用于影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如合约，分成制，合作社，公司，保险，公共社会安全计划）；（3）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之间的联系（如财产，包括遗产法，资历和劳动者的其他权利）；（4）用于确立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框架的制度（如高速公路，飞机场，学校和农业实验站）。^①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1）非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又称为非正式规则、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非正式约束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素。在非正式约束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2）正式约束。正式约束又称为正式规则、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正式约束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一种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3）实施机制。人们判断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有效，除了看这个国家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是否完善以外，更主要的是看这个国家的实施机制是否健全。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制度实施机制的主体一般都是国家，检验一个国家的制度实施机制是否有效，主要看违约成本的高低。^②

① [美] R. 科斯、A. 阿尔钦、D. C. 诺斯等著，刘守英等译：《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3页；[美] 道格拉斯·诺斯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5~226页；[日]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28页；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第34~35页。

②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第38~43页。

二、制度变迁的概念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解,制度变迁^①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制度同其他物品一样,其替代、转换与交易活动也都存在着种种技术的和社会的约束条件。制度变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即所谓“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即所谓“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际制度需求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替代成本(即机会成本)。制度变迁还可以被理解为对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产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际制度需求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转换成本。

制度变迁过程实际上也是制度创新过程,是制度创新主体为获得潜在收益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一种方式安排。制度安排包括个人的安排、自愿合作的团体安排,或政府的安排。^②即制度创新主体包括个人、团体和政府。其中,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创新主体。

制度变迁还可以被理解为制度的交易过程。实际的制度交易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交易成本。制度的交易成本是有关的制度主体在动态的制度变迁中从事对制度这种物品的交易时所付出的成本,而不是有关经济主体在静态的制度结构中从事对其他物品的交易时所付出的成本。^③

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迁区分为两种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纯粹因在不同选民集团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④

^①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W. 布罗姆利将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观点概括为三种:第一种是“产权学”的概念;第二种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概念;第三种是与道格拉斯·诺思联系在一起的。布罗姆利又提出了第四种扩展观点。参见[美]丹尼尔·W. 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② L. E. 戴维斯、D. C. 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J],载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1页。

^③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第80页。

^④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J],载于[美]R. 科斯、A. 阿尔钦、D. C. 诺斯等著,刘守英等译:《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0~409页。

第二节 区域经济的概念及区域的划分

一、区域经济的概念

经济学中关于区域的概念尚未有明确的定义，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E. M. Hoover）于1970年提出一种定义具有较大的影响。胡佛认为：区域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它可以按照内部的同质性或功能一体化原则划分。^①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也对区域的概念进行了系列的讨论，郝寿义、安虎森提出，区域是指便于组织、计划、协调、控制经济活动而以整体加以考虑的，并考虑行政区划基础上的一定的空间范围，它具有组织区内经济活动和区外经济联系的能力，常由一个以上以高级循环占重要比重的中心城市、一定数量的中小城镇以及广大乡村地区所组成。从以上概念中可以看出，区域是一种实体的概念，又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但往往没有严格的界限，实际应用时常常以行政区划界限为界限。区域一般说来可区分为三个层面，即：一国内的经济区域；超越国家界限由几个国家构成的世界经济区域；几个国家部分地区共同构成的经济区域。在大多数情况下，区域这一概念表明的是—国经济范围内划分的不同的经济区。

区域经济是一个不断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过程，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深化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力布局日趋合理，区域内产业结构、各项经济功能日趋完善，区域经济实力也日趋加强，这正是区域经济的成长过程。区域经济发展阶段论认为，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通常经历五个发展阶段：自给自足阶段、乡村工业崛起阶段、农业生产结构变迁阶段、工业化阶段和服务业输出阶段。这是在封闭的区域经济条件下来研讨区域经济发展的。以开放程度为标准，区域经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国内开放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和面向国际市场的开放型区域经济发展阶段。^②

^① 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8页。

^② 贾俐贞、贾俐俐：《区域经济政策的三大理论基础》[J]，载于《改革与战略》1999年第1期。

比较优势理论包括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静态比较优势是自然形成的比较优势，是由此区域与彼区域的差异性表现出来的。构成这种差异性的因素有：自然因素（包括气候、土壤和植被、矿产原料、燃料、动力、森林和水力资源等）、社会历史因素（民族、习惯、人口等）和经济因素。自然条件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客观因素。人类的生产在任何情况下都离不开外在的自然。但客观的自然条件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有的区域自然条件优越，自然资源丰富；有的区域自然条件较差，自然资源不足。正是由于每个地区的生产要素禀赋不同，为了有效利用各种生产要素，各地区在地域分工以至国际贸易中应该利用禀赋好、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来从事生产经营，只有这样才能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利用禀赋差、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来从事生产经营，则会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根据上述原理，劳动力资源丰富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有利；矿产资源富集区，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比较有利；资金供给比较充分的地区，发展资金密集型产业比较有利。因为任何一种丰裕的资源的存在，都可以或是降低地区特定部门的产品生产成本，或是提高产品质量，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其结果都会增大产业利润。资源的区域优势对提高特定产业部门的利润起的作用愈大，则区域对这种部门的吸引力也就愈大。在此，还需指出的是，由于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各国各地区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资本资源等方面的禀赋条件、稀缺程度和分布组合特征一般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表现出优劣并存、长短互见，彼此都有所求的特征。这种资源需求与资源分布之间存在的不对称现象，是推动各国各地区间相互依赖、互相补充的内在动力和制定区域协作和联合政策的重要基础。我们要发挥地区优势和特色，塑造新型的地域分工格局，就要合理利用静态比较优势。

动态比较优势是静态比较优势的发展和完善。其基本点是：地区比较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变的。

二、区域的划分

区域的划分是区域经济学中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最早进行地理区域划分尝试的是 A. J. 赫伯森，1905 年他提出了“世界大自然区域草案”；H. J. 弗勒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提出将我们居住的地球划分为七类区域：饥饿区、虚弱区、增殖区、成就区、困难区、流浪区和工业化区。在区域划分思想的影响下，英国很快编制了第一幅以功能为指标的分区图。西方区域经济学家

布代维尔 (Boudeville)、克拉森 (Klaassen)、汉森 (Hansen) 曾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区域分类方法, 至今仍被区域经济学界广泛应用。布代维尔主张将区域分为均质区域 (homogeneous region)、极化区域 (polarizable region)、规划区域 (planning region) 三类。均质区域为具有某些共同特点的多个不同空间单元组成的区域, 极化区域是由在功能上彼此紧密联系的异质单元组成的区域, 规划区域是为了以最经济的方式实现一定目标而设定的连续空间。^① 对于区域的划分, 通常采取前两种基本的方法。当我们选择划分的标准时, 要根据实际需要具体而定, 同时这两种划分标准之间也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而是可以结合在一起运用的。

目前, 国内外有些学者尝试着运用各种方法对中国传统经济区域进行划分, 美国学者施坚雅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施坚雅利用上述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根据共同性的标准划分中国的经济区, 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 以沈阳为中心大都市的东北区域, 以北京为中心大都市的华北区域, 以西安为中心大都市的西北区域, 以重庆为中心大都市的长江上游区域, 以武汉为中心大都市的长江中游区域, 以上海为中心大都市的长江下游区域, 以福州为中心大都市的东南沿海区域, 以广州为中心大都市的岭南区域及以昆明为大都市的云贵区域。^② 施坚雅的研究成果确实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影响了许多学者, 对研究中国传统区域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但是, 施坚雅对中国经济区的这种划分方法仍然有许多可以商榷之处, 如当时云贵区域并非仅仅存在一个中心, 而是存在多个中心。同时, 施坚雅在对中国区域划分的时候, 忽略了一个事实: 中国是一个土地面积广大、地质地貌十分复杂的国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面积广大, 各地自然环境差异非常大, 二元经济结构十分明显的实际情况, 要想简单地依据某一项指标, 将全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域, 难度是非常大的, 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关于这一点, 我们从 200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夫·格兰杰教授 2007 年 5 月 12 日到上海交大为师生们作的题为“股票市场的价格预测: 给预测者的启示”的学术演讲中可以得到一定的启发: 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很难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 那就是“大规模效应”。中国幅员辽阔, 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经济特征, 因此, 不能把区域的经济模型简单相加, 就得出关于整个国家的经济模型。^③

① 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 第 3 页。

② [美] 施坚雅:《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J], 载于施坚雅主编, 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年, 第 335 页。

③ 徐敏、栾吟今、孙云:《激情股市的黑色幽默》[N], 载于《文摘报》2007 年 5 月 20 日。

就拿贵州来说，贵州西部连接云南，为云贵高原的东部，高原高度自西向东降低，由威宁的2200多米降至黔西的1250米左右。东接湘赣丘陵，地势西高东低，海拔自2000米至700~800米不等。境内地貌类型复杂，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85%，丘陵占10%，盆地和河谷平原仅占3%。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2~18℃，年平均降水量1100毫米，具有冬暖夏凉、复杂多变、立体气候明显的特征。河流顺地势向北、东、南三面分流，分属长江和珠江流域。贵州的土壤各地差异比较大。中部及东部广大地区以黄壤为主，为湿润性常绿阔叶林带；西南部以红壤为主，为偏干性常绿阔叶林带；西北部多为黄棕壤，为北亚热带成分的常绿阔叶林带。此外，还有石灰土、紫色土、水稻土、泥炭土、沼泽土、红黏土等类。

贵州生态环境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区域的形成，尤其是在现代交通、现代信息建立以前，历史越往前推，这种影响的程度就越深。地处云贵高原东端的贵州，经济区域的形成有着明显的山地高原型特征。贵州南北分属于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所形成的经济区域分别与所属流域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些甚至可以当做是跨省区域经济的一部分。贵州气候、土壤的立体性、多样性，决定了各个不同类型的地区农业产业结构的差异性与多样性。

我们从上述所论及的区域概念可以得出：贵州区域可以作为一个行政区划，也可以作为一个经济区划。^①如果将其当做经济区域的时候，它的界限就不像行政区域那么明显，实际上是比较模糊的。因为本省有些地区并不完全包括在这个经济区域之中，而外省又有部分地区包括在这个经济区域之中。但是为了研究方便起见，我们暂将行政区域范围当做经济区域范围。

我们按照均质区的标准大体可以将贵州区域划分为：（1）按产业划分，可分为农业区、林业区、工业区、商业区。（2）按经济技术水平划分，可分为中心区域、次中心区域、边缘区域。在此，我们仅讨论后者的基本情况，并且还需要说明的是，中心区域、次中心区域、边缘区域也是一个动态的区域概念，因为在历史上不同的阶段，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① 以行政区域为单元组织经济活动，即形成了行政区经济。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行政经济区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现象。参见陈晋肃：《21世纪中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问题与出路——刘君德教授访谈录》[J]，载于《探索与争鸣》2002年第4期。

第三节 贵州经济区域的形成

一、多中心下的区域格局期：贵州建省至清末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置贵州都指挥使司，建立省一级的军事机构。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置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建立省一级的行政机构，与四川、云南、湖广（湖南、湖北、广西）布政司分立而治。由于该机构是省一级最重要的机构，后人往往以此年作为贵州建省之始。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设置贵州提刑按察使司，至此，贵州三司机构全部建成。明代中央政府在贵州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贵州成为当时全国两直隶（北直隶、南直隶）和十三个行省之一。清代统一以后，地方的行政制度沿袭明代旧制，在每省设立布政使和提刑按察使分管行政和司法，同时还实行督府制度。行省之下为府、县两级，府、县以外还设立有州。州分两种，一种是直隶州，直隶于省，与府相当；另一种是散州，下属于府，与县相当。另外还新创有“厅”制，厅大多设立在新开发的地区。厅又分为两类：一类是直隶厅，直属行省；另一类是散厅，相当于县。清代，贵州仍为一独立行省，其建置进行了调整和完善，除设置府、县以外，还设立有直隶州、散州，直隶厅、散厅；其四周疆域也基本确定，省内区划较明代明晰完整。清代贵州建置的完整与区划的调整、明晰，主要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州、县的增设；第二，省级间地域的调整与划拨；第三，省内府、州、县部分隶属关系与名称的变更及“插花”地的调整。贵州疆域经过清代的这次大调整以后，基本上与今天的地域范围一致。其四周界为：东至湖南晃州厅界，南至广西南丹州界，西至云南沾益州界，北至四川綦江县界，东南至广西怀远县界，东北至湖南永绥厅界，西南至云南平彝县界，西北至云南会泽县界。全省土地面积为17万余平方公里。^①至清季末期，全省划分为12府、3直隶厅、1直隶州，府以下设州（散州）、县、散厅，共67州、县。^②详见表1-1：

^① 李振纲、史继忠、范同寿：《贵州六百年经济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8~61页。

^② 张在普：《中国近现代政区沿革表》[M]，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7年，第179~188页。

表 1-1 1820~1911 年贵州行政建置一览表

府州别	治所	府州所辖州县	州县数
贵阳府	贵阳	贵筑、龙里、贵定、修文、开州、广顺、长寨、罗斛、定番	9
安顺府	普定	普定、郎岱、永宁、镇宁、归化、清镇、安平	7
遵义府	遵义	遵义、绥阳、正安、桐梓、仁怀	5
都匀府	都匀	都匀、独山、荔波、都江、清平、丹江、麻哈、八寨	8
镇远府	镇远	天柱、镇远、台拱、黄平、施秉、清江	6
思南府	安化	安化、思南、印江、务川	4
石阡府	龙泉	石阡、龙泉	2
思州府	思州	思州、青溪、玉屏	3
铜仁府	铜仁	铜仁	1
黎平府	开泰	开泰、下江、永从、古州、锦屏（1832 年裁入开泰县）	4
大定府		大定、黔西、毕节、威宁、水城、平远	6
兴义府		兴义（府）、普安、贞丰、安南、兴义（县）	5
平越州	平越	（直隶州）瓮安、余庆、湄潭	3
普安厅	普安	（直隶厅）、盘州	1
松桃厅	松桃	（直隶厅）	1
仁怀厅	仁怀	（直隶厅）、赤水	2
合 计			67

资料来源：张在普：《中国近现代政区沿革表》，1987 年。

贵州建省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起点，自建省至清代末期近 500 年里，其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发展成熟程度进一步加强，并形成了由多层次构成的若干经济区域。①中心区域：以贵阳为中心的黔中区域，以安顺为中心的黔西区域，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区域。②次中心区域：以镇远为中心的黔东区域，以都匀为中心的黔南区域，以兴义为中心的黔西南区域。③边缘区域：以毕节为中心的黔西北区域，以铜仁为中心的黔东北区域。各种经济区域的基本情况如表 1-2：

表 1-2 贵州经济区域基本情况一览表

区域类别	地区	人口 (1711 年为户, 1820 年为口)			土地 (平方公里)		
		1711	占全省%	1820	占全省%	1820	占全省%
经济中 心区	贵阳府 (黔中)	23682	8.5	741009	14.0	17700	10.1
	安顺府 (黔西)	38437	13.9	769775	14.5	12900	7.3
	遵义府 (黔北)	30884	11.1	591598	11.2	16200	9.2
经济次 中心区	镇远府 (黔东)	9627	3.4	550334	10.4	11700	6.6
	都匀府 (黔南)	22820	8.2	222232	4.2	15300	8.7
	兴义府 (黔西南)	23480	8.5	309481	5.8	9600	5.5
	大定府 (黔西北)	29710	10.7	553791	10.5	17100	9.7
经济边 缘区	思南府 (黔北)	6630	2.4	335882	6.3	12300	7.0
	石阡府 (黔东北)	6790	2.5	95164	1.8	900	0.51
	思州府 (黔东)	6867	2.5	126191	2.4	2700	1.5
	铜仁府 (黔东北)	4300	1.6	131261	2.5	3000	1.7
	黎平府 (黔东)	63653	22.9	272898	5.2	11100	6.3
	平越州 (黔中)	10781	3.9	367608	6.9	6300	3.6
	普安厅 (黔西)			74705	1.4	4650	2.6
	松桃厅 (黔东北)			113823	2.2	2400	1.4
仁怀厅 (黔北)			34284	0.65	2700	1.5	

资料来源：张肖梅：《贵州经济》，1939年；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1980年。

说明：表中康熙五十年（1711年）兴义府人口数量实际为南笼府的人口数量。

根据表 1-2 的内容，我们详尽地分析清末贵州每一个经济区划的基本内容。

1. 黔中经济区。该区主要包括乌江以东、以南，佛顶山以西，苗岭以北的地区，主要城市有贵阳、贵定、修文、开州、龙里等。贵阳地处经济区的中心，是全省交通中心与枢纽，也是联系外省的中间点。贵阳早在元代时设立为元顺城，明代建省将贵阳定为省会，以后一直成为贵州省的省会。省会贵阳成为湘黔、滇黔、川黔、黔桂驿道网络的结点，是云南进出的咽喉，为“川桂锁钥”“滇南门户”，可见，贵阳在贵州的中心地位开始凸显，并逐渐成为西南重镇。湖广至云南的驿道上，每年过往的马不下 3000~4000 匹，运

夫数以千计，过往官兵、商旅人数更多，作为这条驿道上的重镇——贵阳的商业由此发展起来。贵阳的商业发展开端是明代的“开中”，即官府“募商人纳米中盐”。由于政府的鼓励与提倡，各地商人汇聚贵阳，利用各种方法取得的粮食最终出售给卫所官兵而换取“盐引”。明代贵阳城内外形成了14个坊市：治城内有三牌坊市、四牌坊市、谯楼街市、凤宪坊市，北门内有北市，北门外有馆驿前市、十字街市、凤鸣桥市、洪边巷口市、渔巷铺和兔场市，南门外有马荣街市和猴场市。城内还有绣衣坊，为裁缝会聚的场所。其中北门外是新辟的商业区。清代贵阳北门外新城出现了许多商业街，著名的有西会馆街、广东街、南京街、普定街、仁寿街。西会馆街因山西、陕西会馆得名，成为当时贵阳的金融一条街。广东街是清代兴起的一条商业街，长不足300米的街道两旁拥有三十余家丝线铺，最早的是“钱家老店”，以后又有刘氏的义兴仲、义和生、义厚祥、义和祥、义盛祥，汤氏的汤福兴、汤福隆、福兴隆，卢氏的义利生、义利兴，此外还有傅洪顺、钟义成、殷茂盛、杜春荣、冉聚昌、义生祥、冯乃盛、罗恒发、孙文泰、春生茂、刘鑫盛、杨恒兴、吴万中、蒋华先、张中荣、郑厚福等店铺，正因为如此，广东街俗称为“丝线街”。南京街主要经营菜油、大米及香蜡纸烛。普定街主要经销“广货”（外地货物）与土特产。仁寿街可能是当时的水产市场。商业发展的突出表现就是外地客商增加，清代康熙年间以后贵阳出现许多会馆并进而形成商帮。会馆是乡亲们经常会聚的场所，是商务繁忙的交易所，也是信息交流的重要场所。当时贵阳有擅长经营钱庄的山西帮，开当铺的陕西帮，运销丝绸、百货的江南帮和浙江帮，经营瓷器、菜油的江西帮，经营布匹的两湖帮，从事长途贩运的广东帮和福建帮，运销食盐或做手艺的四川帮等。^① 贵阳凭借区位优势，逐渐发展成为区域重要的货物集散地。黔中经济区内有系列的坝子，其中以贵阳坝子最为著名。这些坝子土地肥沃，有较好的水源，稻田分布广泛，粮食产量较高，是贵州农业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该区还盛产桐油、五倍子、蚕桑、茶、鸦片、烟叶、棉花、土布等。

2. 黔西经济区。该区主要包括北盘江以东、以北，乌江上游以南，东邻黔中经济区的广大地区，主要城市有安顺、清镇、镇宁等。安顺，为黔西重镇，位于滇黔道上，明初设普定卫，后又设立安顺府。清初云贵总督半年驻安顺，半年驻云南曲靖，并且贵州提督驻此。可见，安顺的地理位置非常重

^① 郭长智、史继忠、何静梧：《贵阳城市发展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7~59页。